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樊晓燕,董怡然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强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依靠文化的力量和文明的底蕴实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具有内生性和外部性特征,蕴含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等宝贵理念,其文化基因集中体现在“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四个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特质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局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特质,分析其基本内涵、文化基因和当代价值,有助于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文化基因;中华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1;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4.00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4-0001-08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1]。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融合和浸润着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这一特质贯穿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从理论本质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局限,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融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体现了文化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国内学界多将和平发展看作中国

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2-3]、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性^[4-7]、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8-9]等方面,也有学者针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内涵和内在特质展开了研究^[10-12]。既有研究多以西方现代化道路为镜鉴,将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及其时代价值挖掘不够。鉴于此,本文拟将和平发展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之下,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

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贯穿始终的标志性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理念源于中国深厚的文

收稿日期:2025-03-01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2023A024);西安交通大学2024年度“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专项(SKZX2024010)

作者简介:樊晓燕(1974—),女,山东省济宁市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董怡然(1999—),女,河北省石家庄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化基因,强调和谐、平衡和可持续性,与西方的现代化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可以说,“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13]。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可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理解。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具有内生性。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内部创新而非对外扩张的方式破解发展瓶颈,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近代历史境遇的坚定选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反对对外扩张和殖民战争的,强调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回溯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无论是对内治国还是对外交流,中国历来主张德治,从未有过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诸夏先民与四周的“蛮夷”经历了无数战争和大量的牺牲,逐渐促成了轴心时代的理性反思,进而确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反战与和平的轴心文化,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内外纷争从此终结,而是轴心文化为战争提供了一条稳固的价值评判标准,这一标准体现了中国文化对和平与反战的高度重视和深刻追求^[14]。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和掠夺,深知和平发展的可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仁爱、和平与共存,这不仅体现在内政外交的实践中,更贯穿于历代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中,形成了独特的“和”文化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提出了以保障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为核心的外交政策。1953年12月,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该原则为不同国家提供了有效沟通的平台,是中华文化精髓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时代变化和中国发展的需要,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中国与世界的发展趋势,运用与时俱进的“和”文

化理念,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倡导和平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根植于悠久的文化传统,更在近现代历史中得到强化和验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支撑。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具有外部性,强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超越“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模式,在和平的前提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和平方式实现自身发展,反对军事扩张和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15],中国坚持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鲜亮底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日益加剧,尽管国际形势总体保持和平与稳定,但局部冲突和动荡仍然存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演进,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科技的快速发展使战争的破坏性愈加严重,冲突和战争带来的灾难被无限放大,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在此背景下,和平成为必然的选择。只有主动适应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才能在保持外部环境和平稳定的同时实现自身发展,并通过良好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外交政策立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搞强权政治,不谋求霸权。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一贯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各项原则,坚决反对战争和冲突,主张通过和

平的手段,以对话和协商的方式来化解国家之间的分歧。这是中国对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积极回应,超越了“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是打破西方“修昔底德陷阱”话语权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独特发展路径的体现,不仅反映了中国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深刻理解,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坚定选择。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底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根脉,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起到的是促进作用。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实现和平发展,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文化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11]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中华文明绵延数千载而不断绝的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和平发展;因中华文明而拥有深厚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其本质上是西方霸权思维的产物,过度强调文明间的冲突。事实上,文明间的冲突并非常态,也并非不可调和。亨廷顿虽然没有详细阐述化解“文明冲突论”的具体方法,但也不得不承认不同文明间存在交流借鉴的空间。当前,“文明冲突论”“国强必霸论”“西方中心论”等西方话语仍在试图操控文明

话语权,其作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带来的危害不容小觑,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直接对立物和批判对象。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语境中,任何一种文明都体现了个性与共性、差异与同一的辩证统一,不同文明之间可以实现对话交流、和平共处、和谐共存。无论是过分强调自身文明的普遍性,还是片面突出自身文明的特殊性,都可能引发“文明冲突论”。与“文明冲突论”不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在尊重差异中寻求和谐共存的新发展模式。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并尊重并支持^{[16]323}。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力求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良性互动状态,促进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尊重和合作,以应对当今复杂多样的全球挑战。“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突破了“文明冲突”的思想束缚和“零和博弈”的思维陷阱,彰显了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向心力和持久力。和平发展是尊重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包含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三重意蕴。和而不同强调要尊重事物的客观差异性,在保持不同主体独立性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以实现融合共生。求同存异强调了对外来事物的包容性,存异是求同的前提,从矛盾的基本属性角度来解释,矛盾的斗争性是矛盾的同一性存在的前提,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就没有矛盾的同一性。合作共赢则是在秉持正确义利观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强调要尊重不同主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当前,国际局势呈

现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将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理念融入实践中,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制度和模式虽有差异,但是可以通过互惠合作实现共赢,深刻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共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不仅为自身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持,也为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贡献了宝贵经验和崭新思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内生文化基因,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的“和”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涵盖了个人、社会、国家等领域,蕴涵着“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的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高度契合。

其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先哲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形成的和谐理念,强调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共生共存关系,凸显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两者和谐发展的统一。儒家思想提倡一种入世心态,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儒家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同时也隐含了人类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哲学观念。孟子进一步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主张天道与人性相统一,人性源于天性,强调了人类行为应符合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荀子则在此基础上指出“天行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提倡在顺应自然

规律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以实现更高层次的和谐。道家以出世的心态,强调天的自然状态,注重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共生。在社会治理方面,老子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顺应自然规律,提倡无为而治,减少人为干预。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强调人应该顺应自然,超越自我的局限,达到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主张人类应当自觉遵循自然规律,通过对自然的理解和尊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社会层面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共同构建和谐社会。因此,“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表达,更是一种全面的、涵盖生态和社会的和谐发展理念。

其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协和万邦”的文化思想是“和”文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重要体现。古代先贤在“天下为公”理念的指引下,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和平发展原则。《尚书·尧典》提到,通过弘扬大德来促进家族的和睦,从而有效治理百姓,进而协调各邦诸侯的利益,实现百姓安乐和邦交和谐的目标。儒家坚守尚仁反战的基本立场,孔子认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通过修养“文德”和“克己复礼”来治理国家,避免使用战争和暴力,在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化解冲突。孟子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反对攻城略地的不义战争,主张实行仁政的王道,反对武力强制的霸道。荀子主张“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施行仁义之道以赢得天下臣服。道家坚持反战的和平思想,倡导天下有道,老子主张

“不以兵强天下”(《道德经》第三十章)。墨家以“兼爱非攻”为代表思想,墨子提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通过兼爱来建立太平社会。不只是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也明确传达出了避免战争的慎战思想和赢得战争的和平战略,力图谋求最大限度的和平,强调“非危不战”。和平思想作为兵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方略,体现了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事实上,和平思想不仅深植于治国理政的理论中,也在中国历史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历代明君良相多以德治天下,注重民生福祉,追求内政和谐与对外关系的和平。例如,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和亲政策”,通过婚姻联盟缓解了与周边民族的冲突,彰显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稳定的智慧。明朝时期,郑和七次下西洋,通过友好交流和文化传播,不仅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堪称和平外交的典范。中国对和平的追求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上,也深深融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中,成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宝贵经验。

其三,“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根源在于“和而不同”的精神底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处事方法,彰显了中华民族对世界和平稳定的美好向往。“和而不同”思想最早由孔子提出,是对史伯和晏婴等先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主张通过承认和尊重“不同”来实现事物的和谐发展。晏婴在“和同之辩”中进一步指明了“和”与“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孔子指出要确保家庭关系和睦,关键在于“孝悌”,认为兄弟之间要做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论语·子路》),坚持“和而不同”,

互相尊重,做到既亲密无间又各有独立性。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通过“和同之辩”强调了真正的和谐不是表面的附和,而是基于相互尊重和独立思考,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对话和真诚沟通来解决分歧,从而实现真正的和谐与共识。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孔子坚持反战思想,肯定管仲辅佐齐桓公从而实现天下统一的行为,主张国与国之间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中华民族倡导“和而不同”的良性社会互动,追求和谐、避免冲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特质。“和而不同”在增强文化自信和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发展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不仅强调在多样性中的和谐共存,也反映了中华文明包容、开放的态度,即正确认识文化差异,通过平等交流、对话,达成彼此的理解和包容。

其四,“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人心和善”是以“仁爱”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要求,强调人们应具备善良的内心,集中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文明,不仅是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石。儒家推崇“仁爱”,主张与人交往要坚持仁爱原则,提出以仁爱促和谐的美好社会愿景。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将仁爱思想视为最高行为准则,不仅要求个人在交往中体谅和关爱他人,也强调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应保持公平与正义。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将善视作人之本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和善心性和仁善情怀,进一步发展了仁爱思想。老子主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道德经》第八章),认为上善之人应具有水的品性,与人为善,润泽万物。“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蕴含着讲仁爱、尚和合的价值取向,是以和为贵、与人为

善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倡导在日常生活中以仁爱之心待人接物,追求与他人和睦相处,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和行为表现,不仅塑造了个体的道德素养,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仁爱和善良的推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了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伦理基础,有助于在现代社会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17]。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的“和”文化基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和平发展提供了行动遵循。进一步而言,随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适用范围将不断拓展,从处理国家内部的政党、民族关系,逐步拓宽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文化思想和价值遵循。

三、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当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具有内生性,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文化基因的揭示,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和平进程具有推动作用,而且为全球治理和世界各国和平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考 and 实践路径。

其一,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蕴含的“文

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模式强调和平、合作、共享和互利,反对“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不仅是对传统文明智慧的继承和发扬,更是对现代国际关系中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以合作谋求发展的有力实践,为全球治理和世界各国和平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新的范式。西方现代化理论过于强调冲突和对抗,忽视了不同文明、种族和制度之间交流和合作的可能性。相较而言,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反思、批判和超越,提出了一种基于和平发展的新模式,摒弃了“文明冲突论”“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等旧观念,强调各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与合作共赢,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强调尊重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尊重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倡导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而非冲突断裂。中国主张“文明对话”而非“文明冲突”,倡导和而不同、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在和平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中国的“和合”文化基因,深刻体现了和平发展理念所具有的和平文明属性,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明显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理念,突破了“种族优越论”“制度对抗论”的思想束缚,主张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其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格局和世界体系经历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考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

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日益上升,尤其是俄乌冲突震动全球,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加剧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全球挑战的方案,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为人类社会的长期和平、安全稳定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并在全球范围内凝聚起促进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共识。中国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自身使命和责任,与各国共同推动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走的不是对外侵略扩张的旧路,而是和平发展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途径,展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意识 and 担当精神。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指出:“从‘本国优先’的角度看,世界是狭小拥挤的,时时都是‘激烈竞争’。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世界是宽广博大的,处处都有合作机遇。”^{[16]323}“小圈子”和“小集团”无法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大变局问题,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突破了国别限制,强调国际合作和共同发展,为更好地应对全球性问题,为世界和平和全球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三,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人类文明理论宝库。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存在共通点:两者都是连续、会通而非断裂、分割的,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赋予中华文明和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进程以旺盛的生命力;两者都是历史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在与外部关系方面强调解决纷争,避免冲突。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中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进程才得以不断推进,进而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

展示了一幅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现代文明新图景。作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自成体系,还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与融合,在不断推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引领和精神动力,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价值。通过和平发展的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新的范式,推动全球文明在多样性和共生性中不断前行。和平发展既强调和平又强调共同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要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最新发展成果,为民族复兴注入深厚的文明内涵,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中创造的,依靠的是中华民族的内生性力量,而非战争殖民、对外侵略等霸权行径,体现了和平发展中的和平性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新的文明样态,以和平方式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的互惠共进中创造的,体现了和平发展中的共同性要求,中华民族在实现本民族复兴的同时,愿意同其他民族共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备和平性、共同性的和平发展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普惠共生的文明底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明创造提供了有益尝试。

四、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强调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应通过和平发展的方式,借助文化的内生性力量。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基本内涵,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进程的理解。在文化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内敛式力量实现和平发展,既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基因,又彰显了和而

不同、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鲜明时代品格和大国担当,要探求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就要深入探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积淀。在时代价值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是内生的,非外部强制力所致,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进程,为世界各国维护和平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1-2.
- [2] 陈学明.中国和平发展的社会制度基础:兼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20.
- [3] 田飞龙.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J].天府新论,2023(3):23-39.
- [4] 陈锡喜.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4):4-8.
- [5] 张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诉求[J].人民论坛,2017(21):22-24.
- [6] 高祖贵.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0(12):32-35.
- [7] 涂用凯.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2):9-17.
- [9] 殷文明.中国式和平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和实践意义[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4(4):9-17,134.
- [10] 沈允佳.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根源与意义[J].当代世界,2023(5):57-61.
- [11] 王泽应.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伦理深蕴[J].伦理学研究,2023(1):1-8.
- [12] 刘儒,刘启农,向潇璇.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基于三重向度的比较论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1):23-32.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128.
- [14] 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75.
- [1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0.
- [1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17]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02).

[责任编辑:毛丽娜 聂海杰]



引用格式:樊晓燕,董怡然.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及其当代价值[J].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6(4):1-8.